

“共同体”利益的均衡与共赢

——陈云关于党的宗旨思想的探讨

孙 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 要:“共同体”概念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意指由共同的经济利益、愿望诉求而形成的群体。文章借用“共同体”的有关理论从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和群众利益观来解析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共产党与其领导的全体人民既是经济利益的共同体,也是精神文化的共同体。陈云强调经济建设要综合平衡,以经济利益的共赢奠定政治诉求的基础,在经济工作中实现政治目标,以政治目标推动经济工作。陈云的群众利益观,就是重视、维护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体内部各群体利益的均衡和共赢,充分诠释了党的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关键词:共同体;均衡与共赢;党的宗旨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5-0001-06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体人民谋幸福。从建党伊始,这一宗旨始终不曾改变。“人民”^①的范围是广大的,涵盖了各个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社会成员,他们利益相关,有共同的价值理想,全体人民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但其内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利益”既指物质利益,也包括政治权益以及精神文化权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就是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而实现并保持共同体内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各方利益的均衡和共赢^②,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对于党员干部来讲,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既不是空

洞的口号,也不仅是道德要求,而是体现在执政过程和实际工作中。

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于陈云一生,既体现在思想和政策决策中,也体现在工作作风中。在为人民服务这个问题上,陈云坚守原则,也是“务实”的。在陈云的著作中,“为人民服务”体现在各方利益均衡和共赢的思想,体现在维护共同体和谐共进这一基本原则中。在实际工作中,强调以经济利益的共赢奠定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基础,以政治目标推动经济工作,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体内部利益的均衡和共赢。他说:“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③

收稿日期:2015-07-06

作者简介:孙丹(1963—),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

①本文使用的“群众”与“人民”同义,不包括敌对的部分。

②在理论上,自然人利益的获得是与他的能力、付出、贡献大小等主观因素成正比的,因此,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差距是良性刺激,能够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利益的获得又受到社会环境如机遇、阶层流动性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如果社会提供给大多数人公平、均等的机会,以及合理的、能够承受的差距,各阶层之间能够良性流动,这个社会就是和谐稳定的。如果由于社会环境恶化而导致利益差距过大,就必然引起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社会的不稳定。可见,尽管社会分配中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一个好的社会绝不能损不足而补有余。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均衡和共赢是最好的结果。均衡,也即陈云常常强调的“综合平衡”,既指物的平衡,也重视人的权益分配的平衡。

③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4月4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

“共同体”这一概念,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经常使用,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多有应用。2015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倡导亚洲各国在同一命运共同体中,在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在文化交往中“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①。201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在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②,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国际关系中的共同体,主要追求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均衡与共赢。经济学所谓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是指社会各方在理性估算的基础上以不同方式结成的利益联盟式的行动体。互利共存是这个行动体中利益不同的双方或多方联合在一起的唯一重要的保障。经济利益关联的任何一方在谋求己方利益的时候,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顾及其他各方的利益,以继续维护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而在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中,维系共同体中利益各方关系的,除了物质利益的维度,还有另一个维度,那就是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等精神文化层面的维度。因此,一个政党及其拥护者是由物质利益和思想价值观念两个维度连结起来的共同体,即经济利益共同体和精神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是利益攸关、具有共同信念的整体,同时,在这个共同体内部,还存在着各个不同的子群体,这些子群体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和思想观念甚至政治诉求的差异。这其中,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合理与否,对共同体的稳固与否将起到主要的、主导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党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者,旗帜鲜明地把实现民族独立复兴,把谋求全体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和生活富裕幸福作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创建者以及很多党员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利益集团),与无产者结成经济利益和精神文化共同体,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经过28年的

奋斗,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的伟大梦想,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转为执政。建国以后,特别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广大人民利益相敌对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严重的阶级矛盾、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主流价值体系。从理论和中国社会现实上看,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各族、各界的全体人民已经结成了完全的共同体,即全体人民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无论是在精神文化上还是在物质上的利益和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与全体中国人民不仅是经济利益和精神文化的共同体,也是命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封建王朝,执政者和人民大众的关系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此利益攸关、生死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共同体保持了基本的和谐和稳定。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1世纪,已经从建国初期的积贫积弱迈入了小康的门槛,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共同理想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成为凝聚全体人民的精神纽带。不过,中国是人口众多、面积广大、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各区域间、各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在中华民族大的共同体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样简单的阶级阶层的划分,已经由逐渐形成的各种各样的阶层和社会群体所取代。就是说,在全体人民的共同体中,形成了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乃至不同民族的各种子群体。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存在着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失衡、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等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除了具有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一致性,处在不同层级的子群体,也存在着在社会中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机会成本日益分化,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差距也日益扩大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威胁共同体和谐稳定的巨大隐患。因而,执政者必须协调好

①《人民日报》2015年3月28日。

②《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

各个阶层和各个利益团体的利益,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兼顾“蛋糕”的分配,改变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最大限度地协调、实现共同体内部各方利益的均衡和共赢,才能调动各族、各界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共同理想去奋斗,才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才能稳固。而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形势下,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如何科学、高效地配置自然和社会资源、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考验着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陈云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陈云的群众利益至上、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党的最高利益的原则以及重视和维护共同体内部不同子群体利益的均衡与共赢的思想,贯穿在他的革命生涯各个时期,深刻、透彻地诠释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特别是在领导经济工作时,他总是能够作出正确而稳妥的经济决策,在经济工作中实现政治目标,完成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

二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群众利益和群众工作,提出大官要做小事^①。而他所说的小事,就是为群众办实事,为群众办的实事,小事也是大事。陈云所说的群众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政治权益以及精神文化权益,以经济利益的共赢奠定政治诉求的基础,在经济工作中实现政治目标。陈云的群众利益观,既强调共同体的全局利益,又总是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既争取短期利益,更重视长远利益。在权衡各方利益时,在维护大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坚决维护和兼顾不同子群体的局部利益,实现全局的均衡及各方的共赢。

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每一个政治纲领的实现,都是以经济斗争的形式完成的。党在带领人民实现经济诉求的过程中,通过宣传、动员、教育,实现群众对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国家的理想信念的认同和拥护。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在江苏从事农民运动、领导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候,就十分注意通过实现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来发动农民、启发觉悟的方法。当时的江苏农村,土地日益集中于地主阶级,六十多种苛捐杂税,加上天灾人祸不断,使农民不堪

重负,自发地开始抗租、抗税、抗债,阶级矛盾十分严重。陈云在领导组织农民运动时,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这种情况。他除了提出在思想上武装农民,还提出:“要抓住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军阀强加于群众的一切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灾害的事实,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有计划地在农村提出斗争的口号、任务和方式,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债,反对征工筑路,反对军阀战争等斗争。在策略上,要使各种日常斗争互相推动,汇合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总的斗争。”^{[1]6}在农村建立各种妇女、青年组织时,陈云也要求要“提出适合他们的特殊要求,发动他们参加斗争”^{[1]7}。

1933年1月,陈云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4月25日,陈云在苏区中央机关报上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文中对苏区党和工会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和经济要求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在右的方面,有的地方不去领导工人改善生活,甚至要工人在战争时期忍受资本家的任何压迫,不要反抗;不去解决农业工人分田以后缺乏耕牛、农具、肥料的实际困难;许多工会收了大量的社会保险金,不去救济工人,反而被工会机关乱用。而“左”的方面,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执行只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机械实行8小时和青工6小时工作制;在年关斗争中,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使资本家乘机抬高物价,破坏苏区经济发展。陈云指出:“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极性。”^{[1]8}而“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1]10}。党和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不能只是由工会机关自上而下地提出,而要自下而上地提出,反映工人最迫切的要求”。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使群众有决心为实现他们的这些要求而斗争”^{[1]10}。

陈云处理经济问题,总是把执政党与全体人民

^①陈云提出:“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不论是中央委员还是区委委员,都是群众一级的干部,大官要做小事。”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8页。

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来考虑的。建国初期,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如何度过这个难关,关系到新中国政权的稳固,关系到国计民生,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大考。很多研究者认为,陈云在这一大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于陈云如何发挥重要作用,各有见解。本文认为,陈云正是从把党和政府与全体人民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出发,提出只有包括执政者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克时艰,才能解决危机。而在解决危机的时候,必须兼顾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具体情况,即最大程度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与共赢,例如在公债发行、解决各地物价问题、解决失业问题以及劳资关系等问题上,都充分地体现了陈云的这一思想^①。

1949年8月,陈云在已经解放了的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召集的各厂各业五六百人的会议上,就私营企业与国家利益、私营企业工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很经典的论述:“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赚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是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多生产东西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整体利益。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义务,这就是: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2]22}这是对共同体利益均衡与共赢的思想的极有说服力的注解。历史也证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劳资双方不仅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具有剥削性质的私营企业及其经营者,在经济利益上与共产党政府和广大劳动者已经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允许其发展,则两利,限制、消灭之,则两害。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因长期忽视人民生活而产生的社会动荡,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党的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兼任商业部长,以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方面着手解决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陈云在解决商业工作问题时的指导思想和具体

措施,今天看来也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商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批评商业工作在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时,也有一些不利于人民的地方。他不满于“我们国营商业做生意是‘独此一家’,很有点‘独霸’的味道”,批评“粮食仓库有不少‘溢余’粮食,这同粮食收购单位搞大秤进、小秤出那一套有关”。陈云提出商业部门必须改掉这些使“农民有一肚子气”的毛病。他说:“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②

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时期,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要处理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的比例关系,达到综合平衡。而陈云所强调的综合平衡观点,除了考虑到“物”的因素,还总是把人的因素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最大特点。经济工作由人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身上,人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才是陈云的综合平衡观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谈国民经济问题,其中就谈到人民生活的困难。他说:“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十五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3]209}“除了每人半斤鱼,到明年年底……每人每月可不可以增加半斤肉?……如压缩一部分出口(指猪肉)。这样,鱼、肉两项,五口之家一个月就有五斤。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3]209-210}“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3]210}陈云所说的“牺牲”,究其实质,正是使共同体各方利益达到均衡的一种“牺牲”,但其

①公债发行是建国初期中共执政历史中的重要事件,成功与否关系到政府的信用、人民币的信用等问题。1950年第一次发行公债前,陈云在上海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仔细核算发行债券或增发货币对市场稳定、物价,以及对政府、对不同发行对象的利弊和长远影响等,力争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是陈云均衡与共赢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实践之一。关于公债发行以及解决这一时期的物价问题,学界研究成果颇多,本文不再赘述。

②参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4页。

结果,是共赢。

三

均衡,并非历史文化传统中平均主义的简单复制,而是求得利益共同体中各个子群体之间的利益在一定张力下的平衡,即各方对自己的利益基本满意。共赢,则是指各个子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结果不是零和,更不是负和,而是正和。群众利益不是某些人的个人利益,也不是某一个或某一些群体的利益,而是关乎全体人民的生息和福祉。群众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内容。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从经济利益方面来看,就是要不断发展和提高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不断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劳动所得,不断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从精神文化方面来看,在公平合理有效的法律和制度安排的前提下,要使每个人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有全面发展和思想创造的空间,使所有的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既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也能实现、升华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体现和提升个人幸福指数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原理,“共同体”的维系取决于其内部精神信仰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但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经济利益联结起来的,稳定共同体的基础是经济利益。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学说也是符合唯物主义原理的。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否认利益对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82}“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5]318}“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使群众有决心为实现他们的这些要求而斗争”^{[1]8,10}。就是说,在一个共同体中,只有集体的利益能够覆盖个体利益、只有在实现集体利益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时候,同理,只有在共同理想能够覆盖整个群体并有助于实现个人理想价值的时候,个人才会“有决心为实现他们的要求而斗争”,个体才能甘愿为群体的利益而作出牺牲。这就是“共同体”利益的实现——经济利益和精神文化利益的均衡和共赢的局面——在经济利益目标一致、收益分配取得均

衡、共赢的基础上,共同的理想信念才能成为凝聚民心的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真正的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就更是这样的逻辑。因此,脱离客观实际的口号,本质上就是损害群众利益的空谈,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因此,陈云终其一生都坚决反对不切实际地讲空头政治,要求共产党人不能只做政治首长而不会精确计算,只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6]635}。他在谈干部和群众生活问题时,强调改善群众生活,也并不避谈干部的物质待遇。1962年3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就提出:“(大中城市6000万人口)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钱可以去吃。这样,我们对干部适当照顾一下,群众就不会有多大意见了。现在不少人对照顾干部的办法有意见,这是有道理的。”^{[3]209}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的近百年间,从一块一块的根据地,到最后走向全国,成为受到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拥戴的执政党,“共同体”是不断变化壮大的。维持和壮大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如何达到共同体各方利益的均衡和共赢的过程。没有这种均衡和共赢,共产党所主导的革命和建设就不可能成功,破坏这种均衡和共赢,党的事业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社会就会发生动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云同志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解答。陈云指出:“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1]173}建国初期,陈云就从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3]210}

“群众”也不是永固不变的群体。在大的共同体内部,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联盟。在现阶段,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随着各种经济形式、各种经济体的成熟壮大,全体社会成员分化为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阶层和群体,有弱势,有强势,各阶层群体之间不断产生各种利益纠纷,甚至引发价值观念的冲突。在这些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甚至在党内,正在形成某些与全体人民的共同体相“离心”的特殊

权益共同体^①。这种由少数人组成的特殊权益共同体,垄断和侵占了庞大的社会资源和财富,扭曲和破坏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秩序,时时刻刻威胁着全民共同体的利益,侵害着全社会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而党内“利益共同体”的出现,无疑是全民共同体的最大威胁。试想,如果党政官员都成为裸官,如果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形成官僚特权阶层,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在物质利益、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上迟早会与大多数人民群众分道扬镳,执政党与全体人民结成的共同体也就迟早会瓦解。

近年来,国民“幸福指数”、“幸福感”问题,不仅受到媒体的持续关注,每年都进行相关的问卷调查,发布相关数据,还被不少地方政府纳入施政目标。“幸福”是人得到并感知满足的状态。根据人的需要和满足的程度,幸福感分为多个层次,不同的人对幸福与否以及幸福程度的感知并不相同,甚至可能相距甚远。生理欲望的满足如食色、健康等,心理的满足如情爱、物欲的满足等,是中低层次的满足。精神的满足则是较高深层次的满足,如心灵的安宁与思想的自由等。中低层次的满足实现以后,才会产生高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从群体效应来看,把幸福指数化,可以从经济利益的满足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两方面来考量。

在经济利益方面,幸福指数是否得到提升,不单要衡量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否不断提高,而且还要考察所有的劳动者在一个共同体中是否处于

适当的经济地位,劳动付出与所得是否匹配,在承担社会改革风险的同时,是否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因此,社会保障的能力、贫富差距的大小、经济社会运行的安全度,成为衡量幸福与否的重要参数。在精神文化方面,不单要考量不同群体日益增长的各不相同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而且还要使全体人民在一个共同体中处于适当的政治地位。因此,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程度、对人的各项权利尊重和实现的程度、不同群体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信仰的程度,就成为衡量幸福与否的重要参数^②。

可见,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只有始终维护好不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持各方利益的均衡与共赢,才能不断提升幸福指数,才能使人得到并感知真正的幸福,才能凝聚起全体人民的力量,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治理、文化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郑重地承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7],特别是全面反腐、重拳反贪,加强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治理等举措,深得民心。今天,重温陈云思想,他的群众利益至上、努力实现共同体中各方利益均衡和共赢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和文化诉求的思想和实践,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宝贵思想资源和精神遗产,是开启解决当今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大门的钥匙,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学习和运用!

参考文献:

- [1]陈云.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陈云.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5.

(下转第83页)

①有学者在2007年就提出,目前在一定的社会领域中,存在着“腐败利益共同体”,其特点是“成员彼此互相利用、互相包庇……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官匪一家、家族腐败、集体腐败、买卖官职等”。见宋彦锋:《创新反腐思路,破除“利益共同体”》,《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第69页。

②2008年剑桥大学发布的《欧洲社会调查报告》中,丹麦人的幸福指数最高。丹麦人快乐的秘诀在于“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以及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平衡。丹麦人的诚信由来已久,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哥本哈根一家旅游公司的经理拉斯·约根森说:“我们是一个小国,人们的贫富差距非常小,也基本没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的生活都很安逸。”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rtistic Charm of Song Ci:

the Foreword of Zhang Zhongmou's *Appreciation Course of Song Ci* (Revised Edition)

TAO Wen-peng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uthor's 20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book *Appreciation Course of Song Ci* is not only a suitable textbook with the rigorous teaching system for the majority of readers, especially the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majored in Chinese to progressively cultivate their appreciative and academic ability of Song Ci, but also an innovative academic monograph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elaboration, demonstr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i-ology with both knowledge and fun. The preceding chapters introduced the literary style and evolvement of Song Ci, and put forward his own viewpoints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subsequent ones illustrate the art of composition, syntactic category and word presentation. Chapter 8 focuses on the appreciative methods such as comparative appreciation and mutual proof between Ci and Qu,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readers' analytic and stylistic competence.

Key words: poetry; appreciation; teaching system; academic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张楠)

(上接第 6 页)

The Win-win Equilibrium of the Community Interests:

the Discussion of Chen Yun's Thoughts on the CPC's Tenets

SUN D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which is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fers to the formation of a group with commo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aspirations. This paper, therefore, adopts the "community" theory to elaborate on the CPC's tenets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en Yun's thoughts of comprehensive balance and people's interest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eople under its leadership have shared not only the economic interests' community, but also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Chen Yun stresse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overall balanced to realize the political appeals with the win-win economic interests, that is, to achieve political goals in economic work and to promote economic work with political goals. Chen Yun's viewpoints of people's interests maximize the win-win equilibrium of each group benefits within the community, which profoundly illustrate the CPC's tenets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and its every endeavor is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community; win-win equilibrium; the CPC's tenets

(责任编辑 刘自强)